试论《乐论》诗性言说的特点*

张学海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乐论》是藏族古代的音乐理论著作，它以诗歌的形式，广泛地运用形象和比喻的手法，阐述音乐理论思想，具有诗性的特点，体现了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的方法。这种形象思维方式是古代藏族独特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哲学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萨班·贡噶坚赞；《乐论》；诗性；形象思维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3)05-0099-04

《乐论》是藏族古代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 13 世纪西藏音乐的实践经验，阐述了藏族古代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思想，揭示了音乐艺术的一般美学规律，至今仍对藏族的音乐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作者萨班·贡噶坚赞，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四代祖师。他是精通五明的大学者，在佛教、文学和藏语文学方面的研究上享有盛誉，更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为祖国统一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乐论》是他在音乐理论方面的著作，在藏族文化史上被后代的藏族学者反复的注疏和阐释，成为藏族音乐理论的经典。《乐论》用诗歌的形式，采用大量的形象举例和丰富的比喻手法，阐述了音乐的基本规律，使《乐论》具有丰富的形象，引发人们的想象，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反映了藏族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人文思想上的影响。

一、诗性言说的表征

《乐论》文体为颂体，即藏族格律诗。“第一章论音，计 165 个诗句；第二章论作词，计 108 个诗句；第三章论音和词的结合应用，计 167 句；结束语计 20 诗句，全文共计 460 个诗句，文中除了有 24 个诗句为 9 字句外，其余全为 7 字句。”[1]首先，全诗节奏匀整，结构整饬，体现了藏语语言的音乐美和形式美的特点。藏语是表音性的文字，藏文文字形式的音调，有“不表词义的音调”和“具有词义的音调”两类。不表示词义的音调，近乎《楚辞》中的“兮”，它在藏文中起着完善音节的语法作用，用以构成对称的节奏与韵律，虽然没有实际的意义，却增加了诗的音乐美。其次，在词语方面，“同一个词具有多种不同意义”或“用 2-3 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2](P296)所以，藏语在表意上，或寓意深厚、曲折隐晦；或繁复铺叙、汪洋恣肆；富于或含蓄蕴藉，或酣畅淋漓的诗情，给予人丰富的想象，丰沛的情感。再次，诗人们善用隐语和双关语等表达方式，寓意丰富，韵味悠长。“其原因无疑是当时人们喜欢不以真正的和常用的名称来称呼事物和人，或是出于礼貌，或是由于宗教原因”，密教歌谣“‘故意使用的语言’或者是‘女 仙的秘密语言’”[2](P317)启发了神圣诗人，影响了民间诗。最后，受印度诗学理论“庄严修辞”的影响，藏语写作注重比喻、修饰，把形象化视为写作的生命。《诗镜》是藏族诗学著作，是历代藏族作家写作的圭臬。《诗镜》篇幅最大的内容是讲修饰，对比喻手法的运用，做了近乎繁琐的分类，凸显了形式主义的诗学主张。用诗歌的形式写作是印度传统艺术理论著作的特点。藏

[收稿日期]2013-05-15
[作者简介]张学海（1968-），男，陕西礼泉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
* 本文为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 2013 年一般项目“藏族《乐论》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项目号：2013ZJRW17）的部分成果。

族古代文艺美学著作均译介自印度，所以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具体来说,《乐论》是贡噶坚赞引用古印度学者旃陀罗的音乐理论著作写作而成的,旃陀罗著有《音论聪慧者颈饰》和《乐论聪慧者颈饰》。17 世纪萨迦学者阿旺·贡噶索南扎巴坚赞《五明处之一——工巧明之分支〈乐论〉注释·文殊上师喜悦之雅音明慧意乐功业遍布》中,大量引用旃陀罗的著作注疏和阐释了《乐论》的音乐思想。贡噶坚赞是精通五明的大学者,印度用诗歌写作艺术理论传统无疑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藏族古代对印度艺术理论的吸收,是把它作为佛教经典的一部分,即为佛教传播目的的手段来译介的,而诗歌的形式与散文等文学形式相比,更具有诗意性的特点,更加契合佛教梵天传音的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突出神圣性的宗教意味。《诗镜》说“如果称作词的光,不去照亮轮回界,那么这全部三世间,就将变得黑黢黢”，视用诗的形式写作，为照亮世界的方法。因而,在贡噶坚赞那里,用诗的形式写作《乐论》就有一种明显的宗教价值。

从《乐论》的具体内容上来看,运用丰富的形象和比喻,是《乐论》阐释其音乐理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比喻是通过寻求有关事物相同或相似之处,用生动的形象揭示事物内在联系,发现事物的本质属性。对于音调的应用,《乐论》用形象的比喻的加以说明“扬升好像是如意树,转折就像是开花的藤,中低音似流水潺潺,变化如海水中的月影。在集会上歌声像是狮吼,在僻静处像飞舞的蜜蜂,在智者的面前声如鹦鹉,在愚者面前似孔雀开屏。忧伤时的歌声如引升信念，唱情歌似被爱神花箭射中,唱祭祀歌曲如喜人之花朵,净恶似被盐碱河水洗冲。赞颂己方时声音如神鼓,贬抑对方时似慑服仆从,美妙动听如乾达婆之音,混合犹如成串的花鬘。”不同的音调表达着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成美的音乐。贡噶坚赞在此将不同音调的变化表达的情感运用形象地比喻加以比拟,用来自生活中的物象进行物喻,引发人的想象和联想，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形象、耐人寻味。藏族传统诗学理论把形象化当做修饰的基本原则,在《乐论》这样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中,除了比喻以外,运用丰富的形象阐述音乐理论,也是《乐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乐论》中充满了丰富的形象,从众神的文殊菩萨、妙音金刚和乾达婆,到诸多的人物如上师、伟人、智者、愚人、男人、女人,再到多种的物象日、月、铁钩、犁杖、神树、明灯等等,每一个形象都具有深刻的理论喻义。形象化的理论阐述,一方面是“按各种人所熟悉的事物,因人而异迎合其心意说话”,另一方面“佛陀也曾经说过这番话,这是使众生皈依的方法”,出于现实需要和宗教动机，用形象暗示其理论的诗性言说具有正当性。如在阐述其表演的理论时,以不同表演者的身体动作、举止神情的形象,表述了针对不同的表演内容和对象,艺术表演的一般规律。并以表演者因年龄、性别、地域和生活环境的差异的形象系列,阐述不同的表演者在音调运用上的不同特点。《乐论》以有限的形象表达无限的意味,使人借助典型化的形象,展开丰富的联想与想象,从中体悟作者表达的理论意趣。无论是比喻,还是形象,都使《乐论》的理论阐述更加形象化,可以说形象化是《乐论》修饰的原则。以形象示人,不以抽象的事理教人,言外之意、象外之理要靠读者自己去玩味和体会。因此,丰富的形象和比喻使《乐论》的音乐理论阐述,具有了意境空灵、含蓄蕴藉、韵味隽永的诗性特征。

二、诗性智慧

《乐论》的诗性言说,就是以具体的形象,引发人的联想与想象,体悟其深刻的理论蕴涵。这种诗性言说的方式,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乐论》作为藏族音乐理论经典在西藏文化史上就不断被反复注疏和阐释，其中 17 世纪萨迦派学者阿旺·贡噶索南扎巴坚赞的《五明处之一——工巧明之分支〈乐论〉注释·文殊上师喜悦之雅音明慧意乐功业遍布》最著名。《乐论》的诗性言说与西方艺术理论形而上学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具有 “诗性智慧”的特点。所谓“诗性智慧”是意大利美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的,意指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形象思维的方法。这种形象思维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以己度物的隐喻,一条是‘想象性的类概念’”[3](P339)隐喻的方法,按照维科的说法就是“把有生命的事物的生命移交给物体”,或是“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去,就变成那些事物”。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以己度物就是以人自己为尺度对世界的同化和主观化,在原始时代，这种主观化更具体是指感官化和情感化,从而赋予自然以人的灵魂、生命和意志,把它们看作同人一样具有相同生命和思想情感的对象,体现了原始思维物我浑然一体,物与人互渗的特点。“由生命一体化衍生出来的人即物、物即人的观念,为美学上的东方‘审美同情观’提供了认识和情感的依据。”[4](P25)这种思维“所用的材料是有实体的事物,这些事物是被想象为有生命的,而且大部分是被想象为神的。”[3](P341) 在原始思维条件下,西藏连绵的群山、纵横的江河都被神化了,成为神山、神水。“在混沌初开的音乐感萌生阶段,音

乐性的音高感、节奏感等就已从人声的语音曲折中产生了。这种语音的曲折以及相随的音高关系,就构成了口语声调的扬抑起伏。”[5](P32)而语音的扬抑起伏变化,无疑是出于人情感生活。音乐的节奏形式与人的情感同一,形式是情感的表征,在音乐艺术的萌生阶段中,形式与情感浑然一体。《乐论》的音乐理论是西藏民间音乐的,尤其是民歌经验的总结,把声乐作为主要的对象,它无疑受到这样的音乐美学观念的影响,赋予具体的形象以音乐理论的内涵。所谓“想象性的类概念”就是用形象鲜明的突出的个别具体事例来代表同类事物。它是一种推己知人,由远及近,以少纳多,以已知把握未知,在有限见出无限的直觉想象能力。它突破了事物各个孤立存在的自在状态,沟通了不同时空下的物的联系,具有丰富的创造力,体现原始思维整体性、直觉性、想象性的特点。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依赖感官知觉,由个别认识一般的形象思维方法。音乐形式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诉诸于人的听觉的节奏和旋律,引发人无穷的想象和联想,是音乐审美价值实现的基本方式。《乐论》中曼妙的物喻、丰富的形象,无不引发人们生动的想象与联想,使人在具体的形象背后深切体味到其理论含义。音乐理论著述特点契合了音乐艺术形象与想象特点。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也是理论形成的来源。维科所说的“诗性智慧”,虽然主要是指原始时代和原始思维的,但是“诗性智慧”的形象思维特点,是与抽象思维一起,都是人类普遍思维方式的一种。“形象思维的普遍性基于人类本性的共同性。”[3](P336)抽象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主客两分,重视理性、经验与逻辑分析,最基本的思维单位是概念。概念是人对自然物象规范和抽象,依赖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形象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主客交融,重视体验、综合和整体把握,最基本的思维单位是形象,它是人感知觉的对象。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方法论。从思维科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形象思维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与西方传统上注重“向自然立法”,主要发展了抽象思维不同,东方文化思维的主要方式是形象思维。“在东方文化思维传统中,从来没有将二者(即自然性与主体性——引者注)对立起来,主体并不是只能单向度地从自然那里获取某种规范性,主体可以向自然学习,从自然那里获得的,并非仅仅是外在‘学习’自然,投降自然,主体可以是‘自然’地学习自然,按照‘自然’之道学习自然、依寓自然。……是在与自然一起休戚与共的同时,成己、成物,使‘己’之自然与‘物’之自然,在更高的层次上,成就与呈现出来。”[6]西藏传统文艺美学著作中的诗性言说的特点,既反映了东方文化思维的特性,又体现了西藏传统社会和人文思想的影响。

三、原因探究

藏族世代生活在“世界第三极”,境内高山环侍,江河纵横,山地多,平原少,氧气稀薄、气候高寒,动植物的生长缓慢,加之气候变化多端,往往“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自然条件恶劣。对于早期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人类来说,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带来潜移默化影响:一方面形成了内省式的意识指向,给宗教的发展留下巨大心理空间。相对贫乏的自然生活资源,限制人向自然不断拓展和索取的欲望,转而追求内心的宁静;另一方面形成了万物有灵、敬畏天地、珍视自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倾向。因而,既注重现实生活的具体物象,又追求精神的超脱,成为藏族思想意识的主线,把二者有机结合的形象思维方式,就成为藏族哲学、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等思想、意识与观念背后的主要思维方法。同时在这样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产生了以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并且由于“西藏经济主要由粮食农业和饲养牧畜的结构派生而来的”,“迫使西藏人的生活具有双重形态”[2](P123),形成了定居生活和迁徙生活并存局面的双重社会形态。这种自然经济状况和由此决定的社会生活形态,对藏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不仅形成了藏族重视经验和习惯这一极为朴实的现实态度,而且决定了人们只有在经验和习惯的基础上才能展开思维活动。自然经济的有限需要使人们容易满足于知其然而尽其用,而不去深入探究事物发展的总体规律和本质属性,这是形成经验思维的客观基础。”[7]可以说,经验思维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人的内在自然人化的结果。经验思维肯定了现实生活中丰富的事物和现象的价值,推崇来源于此的知识和经验。所谓经验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运用丰富的经验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联想,以发现事物之间的某些本质联系,它的基本方法就是思维主体对思维对象的直观归纳,往往以既有经验和亲身经验去解释和处理各种事物和现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表象、联想和情感是经验思维的基本要素,而事物具体生动、丰富形象的表象和感官直观特性,既是经验思维的对象,也是经验思维展开基础和根本。从哲学立论基础上来看,在经验思维中,事物的表象

特征与人的感受、情感以及意志统一,事物和现象的感性直观的特点,被视为事物的本真存在,可以说经验思维是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思维中,形象即本真,形象既是形象本身,又是本真,形象超越了自身的实在的,有限性的特征具有了精神的、无限的意味。经验思维在古代藏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作为藏族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法,在藏族社会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经验思维中对自然事物与现象的重视,作为经验思维的一个维度,内化在藏族人的意识观念中,成为深层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乐论》诗性言说的特点,采用有意味的丰富形象阐述理论的方法,可以说是这种深层意识观念的表征。

马克斯·韦伯说,宗教是一个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在藏族的社会生活中,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贯穿着整个民族发展史的全过程,从原始时代的原始宗教,到奴隶社会初期的本教,再到公元7世纪起传入西藏的佛教,宗教在藏族传统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西藏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深刻地影响着西藏的人文思想和思维方式。原始宗教以"万物有灵观"为心理基础,以"互渗律"原则,崇拜一切的自然对象,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神秘性质和力量,而这些事物的表象"在该集体中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的每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敬畏、恐惧、崇拜等感情"[8](P5)原始宗教就是"集体表象"思维。藏族传统社会对灾荒、瘟疫的发生原因的解释,经常使用集体表象进行想象的互渗,并不从事物本身寻找原因。本教崇信各种鬼神,相信巫术的效益。人们通过宗教手段和巫术仪式,将自己的情感、愿望传达给鬼神,以求得鬼神的庇佑。宗教的器物和巫术仪式的言语、动作和情态,是沟通人与神的工具和手段,也被赋予了神性的特征,成为独特的宗教符号,承载特定的宗教意义。因此,日常生活的物象和动作、情态成为宗教象征物,成为神性的载体。在宗教仪式中,鬼神的降临和护佑的力量,离不开这些物象。依此可见,本教的思维方式是通过对物象的直观,唤起神圣的宗教想象和联想,直达本体,它保留了原始宗教表象思维的特点,只不过以特殊的形象和宗教手段,象征地实现驾驭自然力量的目的,具有象征性思维的特点。

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与当地的本教融合,吸收了本教的仪轨,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成为藏民族的普遍信仰,对西藏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入世和出世并重,既肯定现实生活的价值,又追求精神超脱,把现实人生当作攀登精神高峰的阶梯,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密宗,更把肉体的修持视为证悟佛法的便宜方法。从根本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世界观是"缘起性空"说,它认为,宇宙本体和现实事物都是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要素因缘和合而成,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无自性的"空"。"它的根本思想是即事而真,也就是说,现实事相即是真理,所以它重视菩提心、行大悲行,特设方便法,而欲使人于现实事相而能直观宇宙的真理。"[9](P126)所以,藏传佛教虽然教派众多,但在修持方法上,都主张通过对具体事项的体认证悟佛性。在藏传佛教那里,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被赋予佛法佛性的象征意味,二者完全冥合为一,对现实世界的观想是证悟佛法的不二法门。因此"具象思维是藏传佛教主要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借助现象跃过理性思维阶段,从具象直达本体,从直觉进入体验,用感官去诱发心灵顿悟把握佛性的思维方式"[7],"由眼知青色,非思成青色"。直观感性所把握的外在世界在藏传佛教的知识论中被称为现量,不能被感官直接把握的,须经比度推理才能把握的隐秘事物被称为比量。"量唯有现比二量。何以故,所量除自共二相别无他相,缘自相之具境为现量,缘共相之具境为比量。"①现量是比量推论的根据和基础,对事物共相即一般特性的把握,须以对事物自相即个别特性的把握为前提。现量对外界事物的正确把握和感知显得尤为重要。萨班·贡噶坚赞在《量理藏论》的因明学著作中曾经对此做了精妙的论述,分析了正确的现量的价值。《乐论》中形象化修饰方法,无疑受到这种注重感性知识的思想倾向的影响。另外,比量是比度推论的结果,比度推论以宗、因、喻的运思模式展开,宗是观点主张是本,因是原因,喻是比喻。运用事物存在的相同或相似的特点,进行比喻是藏传因明学逻辑推论必不可少的环节。由此可见,无论现量,还是比量,事物的被感性直观把握的形象都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观现思维是显宗的根本思维方法,同时又是密宗思维的基础,密宗的修行是采用具象思维和观现思维相结合的方法。"所谓观现思维"是运用般若智慧直接与对象交通,直观地体认对象,与对象合而为一,实际上就是体悟世界空性获得主观精神解脱的直觉方法。"[10]无论具象思维,还是观现思维,都是形象思维的方法。"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教外别传"、"不立文字"都指向了通过直观形象意会领悟的形象思维方法。在藏传佛教理论支持下,注重对事物的感性直观把握的方式,在藏民族的思想意识扎下根来,成为藏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向度。

(下转第112页)

关人员做好准备,开展合理有效的反馈面谈,对员工的评价做到具体,使员工清楚了解自己的工作情况;要制定改进计划,着力提升员工绩效,找到员工行为或工作方式和组织目标不一致的地方,探讨问题根源及解决对策,督促和指导改进,创造一个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环境,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建立相应的申诉机制,给予员工实际的帮助,持续跟进强化反馈效果;考核结果应用要在绩效反馈过程当中明确体现,通过奖励那些在组织变革中实现绩效目标,行为转变和组织变革强调的方向一致的员工并使其成为表率,使员工清楚个体努力如何获得回报、职业生涯能获得怎样的发展,有哪些培训发展的机会等。

经过绩效计划、沟通、考核、反馈四个环节的持续往复循环改进,实现绩效管理系统本身的健全发展,这一过程有助于发挥职工民主管理或自主管理的效用,为中央企业组织变革活动创造一个明确的目标制度,从而发挥绩效管理机制的作用。但真正走出绩效主义困境,绩效管理机制需要与运营管理、对文化建设、对领导力培养等与组织制度变革的相关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使人这一企业最宝贵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绩效管理为运营效率提供支持和服务,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和治理机制,推进中央企业自生能力构筑[4](P64),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清云.官僚主义最容易被形式主义蒙蔽[J].党政干部文摘,2009(2).

[2](美)保罗·米尔格罗姆,约翰·罗伯茨.经济学、组织与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美)杰佛里·梅洛.战略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王 跃]
[校 对 夏 阳]

(上接第102页)

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在理论著述中,在揭示客观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无疑受到了这种形象思维方式的影响。藏传佛教在西藏传统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使它的形象思维方式成为藏民族的基本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藏民族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悠久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方式,它从深层支配着藏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形象思维以感性直观把握对象世界方法,形成了意境空灵、韵味隽永的形象世界,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人们依据个人生活经验和审美修养,展开丰富的联想与想象,调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对形象的主观感知中体悟其深层意味,体现了"意在言外"的诗性特点。所以说《乐论》诗性言说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的诗歌形式的外在表征,而且表现在它的形象思维的内在思维方法上。

[注 释]

①量,是藏传佛教的名词术语,作为动词是衡量、度量、思量,指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动作,作为名词时,它是指"量识",指认识外界事物的心识。法尊.集量论略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参考文献]

[1]赵康.《乐论》译文注解[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4).

[2]石泰安.西藏的文明[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3]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邱紫华.印度古典美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修海林,罗小平 .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

[6]张大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关于东方文化思维中的"诗性正当"问题[J].山花,2011(5).

[7]彭英全,乔根锁.藏族传统思维方式管窥[J].中国藏学,1993(2).

[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9]李孝本.佛学入门[M].台北:常春树书坊,1985.

[10]乔根锁.论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J].中国藏学,1998(1).

[责任编辑 朱 霞]
[校 对 康桂芳]